

《科利奥兰纳斯》中的本真与非本真存在研究

蒋茜

西华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中国·四川 南充 637001

摘要: 本文以马丁·海德格尔存在论中“此在”的“本真性”与“非本真性”分析为理论基础, 聚焦“自我”与“他者”/“常人”的张力结构, 探究莎士比亚悲剧《科利奥兰纳斯》中的两种存在样态。主人公科利奥兰纳斯坚守个体化伦理准则, 拒斥“他者”情感、价值判断及公共意见的介入, 其极端本真追求使他陷入被放逐与毁灭的困境, 凸显本真存在的孤绝与代价。而罗马公众在护民官操控下, 沉沦于“常人”的匿名宰制, 个体判断力消解, 对事物本真的理解被遮蔽, 体现非本真存在的平均化与无根基性。通过剖析二者对立的存在方式及互动冲突, 本文揭示该剧如何戏剧化呈现海德格尔视域下本真与非本真存在的模式及内在悖论。

关键词: 科利奥兰纳斯; 公众; 本真; 非本真

A Study of Authentic and Inauthentic Existence in *Coriolanus*

Jiang Qi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Sichuan Nanchong 637001

Abstract: Grounding itself in Martin Heidegger's existential analysis of Dasein (Being-there)—particularly the ontological tension between authenticity and inauthenticity—this paper examines the dialectic of "Self" versus "Other" / "the They" in Shakespeare's *Coriolanus*. The protagonist Coriolanus rigidly adheres to his individualized ethics, rejecting all intervention of Others' emotions, value judgments, and public opinion. His extreme pursuit of authenticity culminates in exile and destruction, exposing the isolation and cost of authentic existence. Conversely, the Roman public—manipulated by tribunes—submerges into the anonymity of "the They," dissolving individual agency and obscuring truth, thus embodying inauthenticity's leveling effect and groundlessness. By analyzing these opposing modes of being and their conflict between Coriolanus and the Roman public, this study reveals how Coriolanus dramatizes the inherent paradoxes within Heideggerian authentic and inauthentic existence.

Keywords: Coriolanus; The public; Authenticity; Inauthenticity

1 海德格尔视域下的本真和非本真存在

在《存在与时间》中, 海德格尔对被称为“此在”的人的存在方式进行了现象学分析, “此在”指的是人类在基本本体论意义上的存在。海德格尔认为哲学的根本问题是探究“存在的意义”。按照现象学的观点, “存在的意义”应在能自身显现自身的西物中寻找, 而只有人, 此在, 才具备这样的条件。此在不能与周围世界相分离, 所以此在最基本、最原始的生存状态是“在世界之中存在”, 它包含两层含义: 其一, “在世界之中存在”, 意味着人存在并介入周围世界; 其二, “在之中”是指人按照自身的可能性介入世界而在场。正是“此在”的存在、介入、追求和选择使世界有了意义, 使一个人成为人。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 此在在世界中有两种存在状态: 一种是“本真存在”, 即“此在”从“常人”中解放出来, 正视现状并做

出选择, 把握自己的存在。这是获得自我和自身本质的状态。另一种是“非本真存在”, 意味着“此在”以随波逐流的方式落入常人之中, 失去自我, 这是自身本质被遮蔽的一种状态。

“常人”(the "they")这一术语是海德格尔本体论思想中一个非常独特的概念。在海德格尔看来, 人的世界是共同存在的世界。在这个共同存在的世界中, 出现了“此在是谁”的问题, 而此在变成了“常人”。也就是说, 此在从一开始就是非本真的, 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状态。同时, 只要此在存在, 它就与其他存在者打交道。与此在打交道和共同存在的存在者就是他人。“我们所说的‘他人’不是指除我之外的每一个人——那些与‘我’相对立而凸显出来的人。相反, 他们是那些大多数情况下人不会将自己与之区分开来的人——那些人当中的一员。”^[1]也就是说, 他人

以与此在自身存在相同的方式存在,世界始终是“我”与他人共享的世界。此在的世界是一个共在的世界。即使特定的实际此在不转向他人,并且假设它不需要他人或者设法在没有他人的情况下也能过得去,它仍然处于共在的存在方式中。属于共在的那种疏离性使得此在作为日常的相互共在屈从于他人。此在日常的存在可能性任由他人随意支配。他人或“常人”的力量如此强大,以至于相互共在完全将自身的此在消解到“他人”的那种存在方式中。这样一来,的确,那些可区分的、明确的他人越来越消失了。“在这种不显眼和不确定中,‘常人’真正的独裁得以展开。我们像‘常人’那样取乐和享受;我们像他们那样阅读、观看和评判文学与艺术;同样,我们像‘常人’那样对‘大众’退避三舍;我们像他们那样觉得什么令人震惊。”^[1]疏离性、平均状态和平庸化是“常人”的存在方式。海德格尔解释说:“在这些方式中,人的存在方式是一种非本真性以及不能坚守自我。”^[1]我们出生在共同体中,我们的理解、品味和观点在共同体中形成。因为我们以这种方式生活,我们往往会忽略关于“我们是谁”的根本问题。在我们的日常生活过程中,我们看不到是什么使我们成为人。因此,为了达到本真存在,弄清楚我们是谁,是什么使我们成为人?我们首先必须弄清楚“常人”是如何在不知不觉中“掩盖”本真存在的。

2 公众:“常人”宰制下的沉沦

莎士比亚的三部著名罗马剧《科利奥兰纳斯》《裘力斯·凯撒》《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均以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为蓝本,涉及古罗马三头政治时期(凯撒、庞培、克拉苏)及后三头政治时期(屋大维、安东尼、雷必达)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如布鲁图斯等人刺杀尤利乌斯·凯撒以及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的爱情经历等。然而,这些戏剧虽以历史为基础,却并非对历史的完整再现。在《科利奥兰纳斯》中人物有了很大改变,其中最突出的是对民众的描写。在普鲁塔克的版本中,当民众发现自己的冤屈无法得到补救时,他们的形象相对客观温和。他们只是突然聚集成为一支庞大的队伍,相互鼓励,坚持一起放弃并决定离开城市。他们没有实施暴力和破坏行为,只是单纯地离去。然而在《科利奥兰纳斯》中,这些悲惨民众所遭受的冤屈被轻描淡写。他们的生存危机成了笑柄,他们被描绘成令人讨厌、反复无常、手持棍棒的武装暴民。至于普鲁塔克版本中关于民众的负面内容,莎士比亚基本未删减,甚至将民众原本相对客观中立的形象在其戏剧中改写成相当粗俗的大众。

“公众在剧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2],他们虽然出场次数不多,但贯穿全剧。该剧以混乱和嘈杂开场,第一句话便是熙熙攘攘的人群发出的请求“听我说”^[3](1.1.1)。发出这个请求的人是第一位公民,他是个相当有“影响力的意见领袖”。他声称科利奥兰纳斯是人民的最大敌人,是背叛大众的狗,并提议“杀了他”。虽然第二位公民告诉第一位公民不要恶意诋毁科利奥兰纳斯,因为科利奥兰纳斯为国家做出了很多贡献,但第一位公民更加能言善辩,说科利奥兰纳斯的骄傲已经抵消了功劳,“他这么做是为了取悦他的母亲,部分是出于骄傲”(1.1.37)。然而,当科利奥兰纳斯出场时,第一位公民改变了之前的咄咄逼人态度,转而采取顺从的态度,恭维科利奥兰纳斯,“我们一直都听到你的好话”(1.1.164)。这是公民们的首次露面,他们的反复无常已经展露无遗。

公民们的第二次出场是在第二幕第三场。科利奥兰纳斯凯旋而归,但公民们对于科利奥兰纳斯担任执政官意见不一。曾经辱骂过科利奥兰纳斯的第一位公民现在表示:“如果他要求我们的选票,我们不应该拒绝他”(2.3.1)。最初为科利奥兰纳斯辩护的第二位公民说:“先生,我们可以,如果我们愿意的话”(2.3.2)。而第三位公民认为“我们有权力这么做,但我们又没有权力这么做……所以如果他告诉我们他的高尚行为,我们也必须告诉他我们对这些行为的高尚接受”(2.3.4-9)。公众并不真正理解科利奥兰纳斯的选举,只是随声附和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这种随声附和是“此在”的一种基本的“沉沦”方式:闲言碎语。闲言碎语是一种话语,人们在相互鹦鹉学舌。人们所说的话不是对事物的真正理解,而是一种表面的相似,大致意思相同,总是有相同的理解。这样的话是没有根据的,没有真理的基础,“被说出的东西、格言、声明——所有这些现在都为话语及其所属的理解的真实性以及它与事实的适当性提供担保”^[1](海德格尔)。人们本以为他们对所谈论的事情有了真正的理解。实际上这只是一种自以为是的态度,反而封闭了他们对真实存在的理解。

公民们不仅随声附和,而且反复无常(uncertainty)。甘受护民官的摆布,驱逐了科利奥兰纳斯,处于海德格尔所说的一种“平均状态”。在这种规定了什么可以冒险、什么可能冒险的平均状态中,它监视着所有突出的例外情况。每一种优先权都被无声地压制。正是在这种平均状态中,“常人”本质上生活着,在这种状态中,“常人”没有判断力,处于一种无意识的状态。这种平均状态事先就描述了“常人”可能和将会被允许冒险和尝试的事情。所以就发

生了这样的情况，“‘常人’无处不在，但每当此在要求做出决定时，它总是悄悄溜走”^[1]。科利奥兰纳斯被逐出城市后不久，消息传到罗马，说伏尔人即将进攻罗马。只有在面临入侵时，公民们才意识到科利奥兰纳斯的重要性，他们开始后悔对科利奥兰纳斯所做的事情。公民们在驱逐科利奥兰纳斯的时候没有考虑到可能的后果。但是一旦最坏的情况发生，他们就开始寻找借口并推卸责任。当不需要做决定的时候，“常人”就在你身边，而当需要做出决定时，你会发现“常人”已经消失了。可以说，“常人”不能承担任何责任，因为“常人”不需要为任何事情负责。

3 科利奥兰纳斯：个体化伦理坚守下的自我

在公众的沉沦中，我们看到此在总是受“常人”的引导，听从“常人”的意见。此在的话语是通过“闲言碎语”发展起来的。此在在公众和“常人”的闲言碎语中迷失自我，在听从常人自我时听不到自己的本我。如果此在要能够从这种听不到自己的迷失状态中被带回来，而且如果这要通过自身来实现，那么它首先必须能够找到自己。海德格尔声称：“如果在这种听不到自己的迷失状态中，人被闲言碎语在日常‘新奇性’中所具有的多样的模棱两可的‘喧哗’所迷惑，那么召唤就必须在没有任何喧哗且明确无疑的情况下进行召唤，不给好奇留下任何立足之地。以这种方式进行召唤从而让我们理解的东西，就是良知。”科利奥兰纳斯没有沉沦于“常人”之中，他对自我价值的认同、追求、坚守以及对非本真的反抗都是本真存在的体现。

科利奥兰纳斯热爱战争，他在战场上勇敢无畏，为了国家和荣誉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他对自己的能力充满自信，因此，他不屑于迎合民众，甚至憎恨他们的无知、怯懦和笨拙。在科利奥里，伏尔人出城迎战罗马人，罗马人惊慌逃窜，科利奥兰纳斯咒骂他们。当科利奥兰纳斯的军队进行反击时，伏尔人战败回城，城门打开。科利奥兰纳斯命令他的士兵跟他一起冲进城里，但士兵们说：“鲁莽！我才不干呢。”（1.5.16）。当科利奥兰纳斯独自攻下科利奥里时，士兵们没有去援助科米纽斯，而是去抢夺那些微不足道的战利品，垫子、铅匙、火盆、破旧的上衣。科利奥兰纳斯深刻认识到民众的劣根性，他耻于与民众为伍，认为民众的低贱会玷污他的高贵。

此在首先且总是迷失在“常人”的非本真状态中，若要寻找本真存在，他必须在“常人”中找到自己。科利奥兰纳斯不愿屈服以取悦民众，这虽是例行公事，却为必不可少的礼法程序。他压抑自己骄傲的意识，穿着长长的粗布长袍来到市场，以征得民众的同意，人们因为他的功绩

而同意给予他支持。但在护民官的激昂煽动下，民众轻易地改变了对他的态度，反对他当选。这种行为让他感到屈辱，但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他不得不做出妥协。在这个过程中，他的荣誉和美德受到了考验，他开始怀疑自己的行为是否正确。

“当科利奥兰纳斯屈从于强迫并回到选举中时，他牺牲了自己的本真性”^[4]。然而，当科利奥兰纳斯到达市场时，他发现这一切都是护民官们策划的一场阴谋。护民官们强加的指控不仅剥夺了科利奥兰纳斯所有的荣誉，甚至还迫使他承认自己是一个罪犯，一个背叛城市及其人民的叛徒。面对不公正的指控和极大的侮辱，他忘记了母亲和朋友的嘱托，不顾一切地向民众和护民官发泄自己的愤怒。他宁愿被“流放”“剥皮”和“囚禁”，也不愿“用一句好话去换取他们的怜悯，也不会为了他们能给予的东西而抑制自己的勇气，只需要说一声‘早上好’”（3.3.93, 95 - 97）。“本真与我的意志有关，真理在对我的身份的沉思和宣告中得以表达”^[5]。他本可以收敛锋芒，做一些违背自己意愿的事情，从而拥有无限的未来。但他不想遵循“习俗”，拒绝实施虚假的权谋来获得荣誉，欺骗他人和自己。他选择听从内心良知的召唤，良知呼唤此在回到本己的存在中，不再去听常人，不再迷失自己，不再把芸芸众论当作是主宰，常人认为此在所应是、所能做、所操劳的东西不再能左右此在的视线。科利奥兰纳斯不愿为了权利而委曲求全，绝对坚守自己所看重的“荣誉”，他保持了生命的本真性，证明了他的本性始终是高贵的。他的牺牲虽然悲惨，但让人们看到了他的高尚品质和对荣誉的坚守。

4 结语

生存论困境的悲剧性启示。本真性与非本真性并非简单的二元对立，而是此在在世难以规避的两种基本模态，共同构成了人类存在的复杂图景。科利奥兰纳斯的悲剧命运，以及公众在“常人”独裁下的迷失，共同构成了对海德格尔存在论核心命题——即此在如何在沉沦的日常性中寻求本真性之可能——的戏剧化演绎。该剧的当代启示意义在于，它促使我们深刻反思：在高度社会化的现代生存境遇中，个体如何在必然的“共在”结构下，既保持对本真自我的觉知与持守，避免沉沦于“常人”的平庸化与异化，又能审慎地处理与他者的张力关系，寻求一种可能的、植根于“在世存在”的本真性实现路径。这不仅是理解《科利奥兰纳斯》悲剧内核的关键，更是关涉现代人如何面对自身存在本质的永恒叩问。

参考文献:

[1] Heidegger, Martin. Being and Time[M]. Trans. John Macquarie and Edward Robinson.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2008.

[2] Bevington, David, ed. The Complete Works of Shakespeare[M].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1992.

[3] 本文的莎士比亚戏剧引文均出自朱生豪译本，随文标出幕次和场次。参见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朱生豪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版。

[4] Quinn, Michael. "Caius Marcius Coriolanus: The Self as Art." Shakespeare Bulletin 5.6/1 (1987): 5-8.

[5] Sartre, Jean-Paul. Being and Nothingness. Trans. H. E. Barnes. New York: The Philosophical Library, 1956.

基金项目：南充市社会科学研究“十四五”规划项目“莎士比亚戏剧的存在主义思想研究” (NC25C322)。

作者简介：蒋茜（1998-），女，汉族，四川南充，硕士研究生，助教，研究方向：英美文学方向。